

◎ 欧远方 / 著

書生之見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欧远方 / 著

書



生



之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生之见 / 欧远方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6

ISBN 7-5336-2404-1

I . 书... II . 欧... III .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0789 号

责任编辑: 彭克明

封面设计: 王潇冬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商中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插页: 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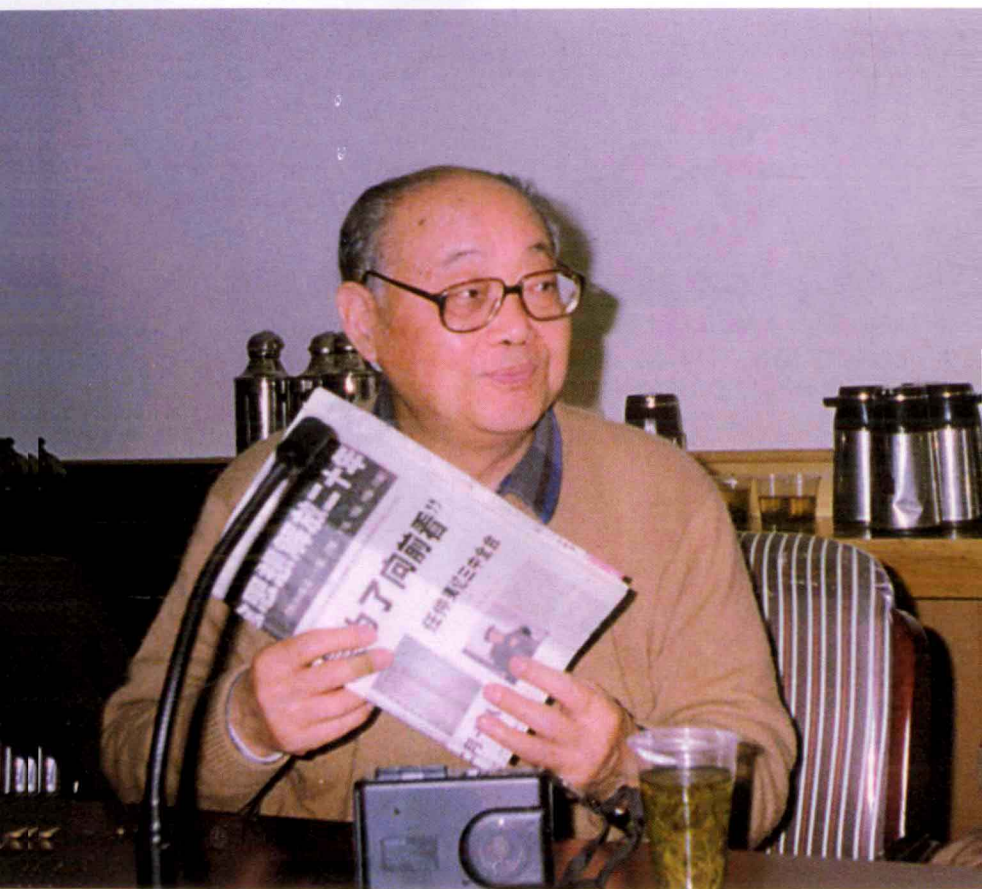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651321

邮 编: 230061







● 欧远方在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会上讲话



● 1990 年和丁伟志
在黄山始信峰上



● 和杜导正夫妇、冯征合影（左起：续志先，欧远方，冯征，杜导正，邹人煜）



● 布鲁塞尔白天鹅旅馆（马克思、恩格斯 1848 年在这里合著《共产党宣言》）



● 和戴逸先生合影（左起第三人为戴逸）



● 和郭崇毅在一起（中为郭崇毅）



● 1998 年在北京和
曾彦修同志合影



● 和王维同志合影（在《安徽老年报》创刊 10 周年纪念上）



● 1985 年访邓岗同志



● 在上海参加孙中山诞辰 130 周年会议（左二：
邓伟志）



● 1998 年在于光远书斋



● 陪胡绩伟夫妇游览合肥包公祠的廉泉

● 和吴炎武同志在滁州醉翁亭



自序

这本集子是《致远集》的姊妹篇，文章多数是近年写的，但没有《致远集》那么杂，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文史，下篇为议论。

为书名颇费思索，蕴之先生在审阅我的《致远集》原稿后，送我三首七绝，最后一首是：“秋水襟怀远俗尘，依然故我一书生，知人论事平生语，间有冰河铁马声。”这首诗对我的评语，用在本书也是恰当的，故将书名定为《书生之见》。

提起“书生之见”，还另有原委。

80年代我和一批学者、专家以及退下来的老同志（其中多数是分管一项专业，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组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咨询队伍，在完成安徽省人民政府下达的《安徽发展战略纲要》之后，又应邀到二十三个县市、五个厅局、一个镇、一个企业进行咨询，另有两三个专业性咨询（如在芜湖进行对外开放的战略咨询）。1990年，我们应某市邀请作战略咨询。整个咨询顺利，唯对个别重点项目的咨询因涉及部门与地区矛盾，我们虽认为合理，并得到该市广大干部群众赞同，但最后还是被否定了。本来咨询属于建议性质，对于咨询意见，被咨询单位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不存在

任何约束力。但令人不解的是，个别人却公开攻击咨询组的建议是“书生之见”。说这种话无疑是对咨询组以至咨询工作的伤害和蔑视。他们大概还不知道世界早有咨询这个行业（而且是一个产业），一个城市、村镇规划，一项大工程，甚至国家大的政策，都要经过咨询论证。中国咨询业务，虽开展不久，但已显示其作用之重大。咨询业的存在和发展，是现代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所必需，是为了避免决策失误，求得最佳效益。我们的咨询建议正确与否，还是让实践检验吧！

在这以后，我陆续写了一批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都可纳入“书生之见”的范围。党的十五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这完全适应当前中国国情，也符合中国人民的要求。1990年前后，我曾根据学习邓小平1980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讲话，写了两篇心得体会。当时腐败现象已很严重，且有继续蔓延之势，贪污受贿金额愈来愈大，犯罪干部的职务越来越高，且腐败之风已侵入司法部门，国人对此无不忧心忡忡，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也不止一次提出警告，并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感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光靠破几个大案、处理几个人或一批人（这方面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是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治本，治本之道在于建立健全制约机制，从制度上考虑问题。这在邓小平的多次讲话中也已提出了。我的心得体会文章

曾在《安徽日报》发表，原标题就是《反腐败呼吁政治体制改革》。限于条件尚不成熟，文章还未能对如何建立制约机制提出像样的具体建议，只是点到为止，未能展开。今天看来，所谓制约机制，关键在于加大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应拥有的必要权力，达到立法、司法、行政相互制约，即制衡的目的。诚然，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我们不能照搬。不过“三权分立”只是一种形式。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可以从实际出发制定自己所适用的形式。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必须使之达到有效制衡的目的。资产阶级既然可以利用他们所采用的制衡形式来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我们也应寻求类似的甚至更好的形式来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这和经济领域里移植国外市场经济机制来发展生产力一样，我们也可以移植国外制衡机制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来达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

党的十五大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提出了深化经济改革和进行政治改革的任务。在十五大精神鼓舞下，今年4月，我写了一篇《五四有感》，初稿曾在本省报刊摘要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阐述了对民主自由的看法，特别是谈到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时，也论及民主有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从陈独秀1940年所写文章中关于民主继承性的观点中得到启发。他的观点我也是赞成的，因为“民主”、“自由”同样属于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在纪念《共产党宣

言》发表 150 周年之际，我重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更加加深了我的认识，即革命、暴动、专政，都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手段，而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让人民享受经济上充分发达了的福利成果，政治上享受充分发达了的民主自由的成果。《五四有感》一文在修改充实后，题目改为《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民主》。

在《安徽老年报》连载发表了 10 篇学习十五大报告的心得体会。这些都是我积压心头多年想说的话，因受十五大报告的鼓舞而一齐迸发出来，因受报纸篇幅限制而未能展开，但基本观点大体都表达出来了。这些文章，现在统一为一篇文章。

在“文史篇”中，有三篇文章需要说明一下，即关于项英、陈独秀、田家英的文章。这两年我利用开会的机会，在湖北武昌区拜谒了项英故乡人民为项英竖立的铜像；在四川拜谒了大丰镇人民为田家英所树的铜像；在重庆的江津市专门访问了陈独秀晚年定居的石墙院，心有所感，爰笔成文，把积压胸中多年要说的话，统统喷吐出来。在我们党长期艰苦斗争中，有不少功勋卓著的人物受到过诬陷，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和不公正的评价。不论当时环境如何，结论如何，凡不符历史事实的，都应根据新的资料和已公布的档案，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扫去蒙在他们身上的灰尘，还历史本来面目。我在《项英像前说项英》一文末尾，以“历史无情”作

为结语。有人说“历史无情也有情”，错误的评价终究会纠正的，这叫“历史无情”，错误终于得到纠正了，这叫“有情”。这是两回事。还有许多人的评价尚待深入研究，未能盖棺论定，还有阻力，真正做到有情并不容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假如带有偏见和感情用事，便谈不上“有情”。

《项英像前说项英》在《炎黄春秋》1998年5月号发表后，反响之大，是我始料不及的。第一个给我写信的，是项英的部下，新四军老干部，原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明同志。他1998年6月11日给我来信说：

李志光同志是新四军老战士，是李又兰的弟弟，他要我转一封信给你，对你撰写的文章很赞扬。交通部周临冰是原（新四军）军部机要员，把你的文章复印散发北京和各地老同志，《南京日报》5月21日还转载了。可见这篇文章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旗帜鲜明，有高度原则性。为此我已复印发有关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同时要《云岭》、《安徽老年报》、《校报》（指省委党校校报）刊出。……真理和正义是永远打不倒的。

杨明同志转来的李志光的信中说：

远方同志：

您的佳作《项英像前说项英》在《炎黄春秋》刊出后，立即在北京的新四军老同志中争先传诵，不少人认为说出了老同志的心声，大家立即以集体名义给杂志社编辑部表扬。

我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和皖南事变史实的研究者，很钦佩您对史实的求实精神，敢坚持原则，说公道话，不随波逐流，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史学研究人员的基本立场。

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工作人员李志光

后来，《中国老年报》、《新华文摘》也原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文摘》副总编辑张跃铭给我来信说：

大作《项英像前说项英》拜读，澄清了许多事实，讲了许多真话，实话，令人敬佩，文章颇有史料价值，故安排转发在本刊8期，以推荐给更多的读者。

不久前，新华社老记者、新四军七师老战士方隍，专程护送她丈夫胡敏如（原新华社皖南分社社长）骨灰到故乡绩溪，返程路过合肥，她介绍《项》文在新华社总社内部引起广泛重视，纷纷购买刊载《项》文的《炎黄春秋》，以至供不应求。

我引用上述材料，目的不在说明我的文章写得如何，而是证明公道自在人心，对一个长期受到不公正评价的党的重要人物（不止项英一人）不是一个“决议”就能抹煞的，也不是哪个人信口雌黄所能歪曲的。我这篇文章所介绍的项英主要事迹，材料主要来源于王辅一同志所撰《项英传》，还有其他资料。王辅一同志以翔实的资料全面公正地评价了项英的丰功伟绩及所犯错误，客观公正。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写出这本巨著，也算“十年辛苦不寻常”了。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介绍项英的电视。看过的人都说好，但因没看到电视节目的介绍，失去了收视的机会。同时，中央电视台又播放了电视连续剧《铁的新四军》，看过的人都觉不满。这部电视剧未能完整准确地反映新四军从成立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的功绩。该反映的大事不反映，不该反映的却反映了；对不该突出的人物突出了，对该突出的人物反而不突出了，对项英尤其不公正。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中央已对项英做出公正评价之后，这部片子还采取如此态度，实难理解，是不是偏见和感情用事还在起作用啊！？

对一个人物，尤其是重要历史人物，从学术上继续探讨是可以的，但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力求客观公正。要避免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人和事，随意地塑造历史。这样歪曲历史是站不住脚的。再说一句：“历史无

情”，历史不容歪曲。

这个集子，还有三篇短文要说明一下。三篇文章介绍了三个人，即郭崇毅、郭因、辛秋水。他们年龄相仿，遭遇相同，都是戴过“右派”帽子被平反的。三人都在人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失去了宝贵的工作时间，他们都是有正义感的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虽因说真话而受到打击，但平反后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努力工作，且各有所成。他们一如既往地敢讲真话，“虽九死而无悔”。他们是真正的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我介绍他们的文字虽短，但表达了我对他们的尊重。我希望他们敢说真话敢于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都能发扬光大起来。

现在，说假话成风，说假话不脸红，说假话可以升官发财，已成为社会公害，追根求源，都是几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派、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流毒。一个说真话的民族竟变成说假话成风，这是炎黄子孙的耻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罄竹难书。经济、科技、教育等等损失，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可以恢复、发展。唯独精神上的伤痕属于内伤，不经过长期的努力是不可能恢复的——这也是中国的忧患，我所写的《忧患意识不可或缺》一文即为此而发。

欧远方

1998年9月28日